

doi:10.13582/j.cnki.1674-5884.2018.04.027

中外大学使命的演变与人才培养的目标

于岩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北京 100192)

摘要:中外大学的办学使命在演化过程中创造性继承,呈现出明显的时代特点。中国古代的“大学之道”注重人文科学的研究和人格的修养,现代大学的办学目的主要体现为一种实用工具,也导致“双一流”大学建设和人才培养产生了系统性偏差。新时期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要增强办学使命的“独特性”和人才培养的“内生性”,通过建构起本土化的人才培养模式,激活大学发展的内生力。

关键词:大学使命;人才培养;高等教育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5884(2018)04-0136-04

大学的办学使命是说明大学办学的基本目的,大学使命不仅涉及大学的办学方向,还直接影响大学的人才培养、学科设置、科学研究以及资源配置等^[1],大学使命因此成为讨论大学各种问题的前提。无论哪一个时代,大学的使命都是对以前大学使命创造性的继承,而不是否定。

1 西方大学使命的演变与人才培养的目标

1.1 中世纪大学的使命

西方最早的大学主要是从欧洲的德国、英国等国家发展起来的。1087年,意大利建立了近代意义上的世界第一所正规大学——博罗尼亚大学。随后,欧洲各地相继出现了大学。从这所最早的大学形成的历史渊源来看,可以捕捉到大学使命的踪迹。中世纪的大学形成,正如美国学者房龙所叙述的:“一个明智之士对自己说,我发现了一个伟大的真理,我必须把我的知识传授给别人。无论何时何地,只要能找到几个听他宣讲的人,他就开始把自己的智慧鼓吹一番。久而久之,某些年轻人开始按时来听这位伟大导师的智慧言词,他们还带来了笔记本,一小瓶墨水和鹅毛笔,把他们觉得重要的东西记下来。这就是大学的起源。”在中世纪,大学是教授和学生的联合体,教

与学是大学最基本的功能,中世纪大学最为重要的使命是“教学”,培养学生是其基本使命。其主要哲学目标是“追求真理的教学和学习”。

用现代大学的职能来表述,中世纪大学的使命主要是“人才培养”,论及人才培养的目标,其主要功能是实行通才教育,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公民。用那些古典学科(文法、修辞学、辩证学、音乐、算术、几何学和天文学)对学生进行通识教育,在此基础上通过法学、神学、医学3科的教学培养律师、牧师和医生等专门人才。教育的目的是通过通识教育和专门技能教育,培养全面发展的人。

1.2 早期现代大学的使命

坚持教学和科研相结合的“洪堡精神”是西方中世纪大学向现代大学转型的分水岭,洪堡大学确立了现代大学“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两大功能。经过700多年,直至1810年,柏林洪堡大学首次将“研究”和“教学”结合起来,倡导“学术自由”和“教学与研究相统一”。洪堡大学成为我们追溯现代大学研究使命的源头,洪堡的教育理念深刻地影响了西方大学的发展^[2],成为后来德国大学的典范,并逐步扩散到美国、英国以至全世界,科学研究成为大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从现代大学的职能来表述,以洪堡大学为分水岭的现代大学的使命主要是“人才培养”和“科

收稿日期:20171225

基金项目:北京信息科技大学2016年度高教研究立项项目(2016GJZD03)

作者简介:于岩(1983-),女,山东烟台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大学发展规划和办学战略研究。

学研究”。论及人才培养的目标,洪堡认为,大学的主要功能是实行“自由的教学和研究相统一”,包括对科学的探求和个性、道德的修养,最终“由科学而达至修养”。“洪堡精神”依然强调大学的本职是培养人。洪堡大学不仅主张确立文学和科学学科的中心地位,还提出重视文科,提高传统文法学科教师的地位,并突出了“由科学而达至修养”这一现代大学人才培养的基本特征,“修养”的形成是教育的终极目的。

1.3 资本主义大工业时期大学的使命

资本主义大工业时期,市场经济充分发展,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实用和功利主义哲学的影响下,大学开始向着多样化、市场化和专业化方向发展。学校开始面向社会、面向职业,向培养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专业人才的方向倾斜。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美国通过 Morrill Act (莫里儿法案)及赠地运动极大地促进了大学与社会的融合,主要表现为增加了农业学院、工程学院、家政学院、企业管理学院等专门学院。现代美国大学服务公众的使命就是在19世纪期间形成的,1862年和1890年, Morrill Act 影响了许多大学,把为公众服务作为与“教学”和“科研”同等的核心使命,新的应用学科也随之发展起来。

从现代大学的职能来表述,资本主义大工业时期的现代大学的使命更加突出了“社会服务”的职能。论及人才培养的目标,其主要功能是通过实行专才教育,为社会发展培养专业人才,把学生培养成大工业生产所需要的专业人才。

1.4 后现代大学的使命

19世纪末和20世纪上半叶,资本主义大工业呈现出越来越多突出的问题,功利主义和市场化对教育文化的冲击已成为全球高等教育的共性危机。当前,有的大学只注重单向度的、实用性人才的培养。到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大家对科技时代局限性的认识越来越清晰,科技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很多由科技进步带来的问题,需要我們具有良好的人文素养才能解决。在科技更迭越来越快的今天,人才培养更需要把握人类文明进步的方向,克服只学习那些对就业和经济立即有用的实用知识,要依靠提升人文素养来培养批判思维和创造性。人们慢慢在思维中重新建构大学的使命和人才培养目标,于是,20世纪末开始,一股向中世纪大学和早期现代大学使命回归的浪潮在高等教育中出现。

后现代时期,社会各界和学术群体已经普遍意识到,单一实施通才教育或专才教育,都无法塑

造优秀人才,只有把两种教育结合起来,才是完整的高等教育。因此,后现代的大学教育是“通专结合”时期,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具有良好公民素质的专业人才,并且探索和完善通识教育的步伐至今仍未停止。

2 中国大学使命的演变与人才培养目标

2.1 中国古代的“大学之道”

《大学》关于“大学之道”提出了“三纲”“八目”。《大学》开篇有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此三者是古代大学教育的总纲,统称之为“三纲”。《大学》除了提出“三纲”之外,还提出了为达到“三纲”而设计的“八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儒学为我们展示的人生进修阶梯。

在“三纲”中,“明德”指的是人要弘扬内心善良光明的德行,修己以形成整全的人格。在中国传统教育思想中,大学教育的第一目标是首先使自己“明明德”,学生自身修养是最基本的部分。“亲民”,这里的“亲”同“新”,指的是使人弃旧图新、去恶从善,是革新、弃旧图新之意。“止于至善”,指的是达到儒家封建伦理道德的至善境界,并且能定止于这种至真至善的境界,守住其先天的本性不游离,不动摇。在“八目”中,实际上包括“内修”和“外治”两大方面:“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是“内修”;后面“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外治”,中间的“修身”是联结“内修”和“外治”两方面的枢纽。两千多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三纲”“八目”强调修己是治人的前提,修己的目的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我们揭示了治国平天下和个人道德修养的内在联系。

此外,科举作为传统教育的代表,从其考试内容可以窥见一斑。从隋朝开始,虽然各朝科举考试科目都在不断变化,但《诗》《书》《周礼》《礼记》《易》《春秋》《孟子》《论语》《大学》以及《中庸》等儒家经典以及从隋唐就开始的诗赋等,历来都是科举考试基本上千年不变的。从各个朝代科举设置的科目可以看出统治阶层的用人取向——更注重“人文精神”,也反映了中国古代的人才需求。总体而言,科举时期,中国教育体制侧重于人文价值与文化教育,包括人文精神、人格养成、人生发展的教育等。

从现代大学的职能来表述,中国古代的“大学之道”集中突出了“人才培养”的职能。论及人才培养的目标,其主要功能是通过实行人文教育,

提高文化素养、陶冶情操,追求和实现人格的完善,这成为人才培养的根本目标。中国古代的文化和教育过于注重人文科学的研究和人格的培养,而忽视了自然科学的探究和理性思想的培养,导致中国的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在封建社会后期一直没有突破性的进展。

2.2 中国现代大学的使命

从世界范围来看,大学的职能是日趋完善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是目前世界较为公认的大学的三项职能。中国的大学制度虽然是从西方学来的,但其在发展中却形成了自己不同的传统。

2011年4月24日,胡锦涛同志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讲话中提出“不断提高质量,是高等教育的生命线,必须始终贯穿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各项工作之中”,为大学提出了“文化传承创新”的新使命。2017年2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指出:“高校肩负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国际交流合作的重要使命。”这是继我国官方文件首次明确提出“文化传承创新”的使命之后,将“国际交流合作”作为高校的又一项新使命,反映出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政府及社会各界对大学性质和使命的新认识,也反映出当代大学内涵的更新和使命的不断拓展。

尽管在中国古代,《大学》中也提出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大学理念,但如前所述,近代大学理念的形成、展现与完善也根源于西方。中国近现代大学的出现可以说是“不得已而为之”。“时局多艰,需才尤急”,中国近现代大学的办学目的是为了富国强兵,它的价值主要体现为一种实用工具,办学体制也是从西方引进而来^[3]。此外,中国大学更多地受到政府和社会的制约,表现出明显的“外生性”。

长期以来,遵循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我国的大学教育确立了大学工作的核心是通过教育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定位。《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再次强调,人才培养是大学工作的中心。但是,中国大学的“外生性”,导致大学每一次变革都是为了应对制度环境而做出的调整与选择。比如,很多高校在提高教育质量方面,提出了很多规划和改革设想,但是,这些工作的最终目标与检验标准却与学生的素质、能力的提高不完全相符,最终工作目标和成果仍然指向了精品课程、各类奖

项等方面的数量,人才培养的中心地位未能真正落到实处。

2.3 “双一流”建设对大学使命的影响

中国的多数名牌都是研究型大学,其声誉主要源自其所从事的学术研究。2003年,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的大学排名中心发表世界大学排名,这被称为“上海交通大学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RWU),是第一个全球性的大学排名。其优势在于,ARWU是依据被显著认可的客观指标进行定量测算,比如诺贝尔奖或菲尔兹奖的获得者数量、在N&S上发表论文的折合数、被科学引文索引(SCIE)和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收录论文数等。而其缺陷在于,由于ARWU只用学术作为参考指标,所以论文的质量和数量对排名起了很大影响。而很多文科学校是很难发论文的,所以ARWU的排名更倾向于理工科,人文学科对于一所大学发展的价值不能充分体现。

ARWU这种依据客观的定量指标对大学办学进行的世界大学排名,导致中国大学的声誉主要源自他们从事的学术研究,人才培养这项中心工作的地位发生偏离,近年来,在“双一流大学建设”过程中,这种倾向更加明显。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政府在积极推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1998年,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也提出了在中国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何衡量?钱颖一在《大学使命的三个根本问题》中指出,世界上许多政府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而投入大量资源,以提高他们在排名中的位置,具体做法是增加在科学和工程方面的论文发表数量^[4]。随之而来的是,这个排名也导致了偏差,当政府制定政策以提高大学排名时,他们只专注于研究,而且大多是自然科学和工程方面的研究,从教学、人文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方面转移了注意力,而这些领域比其他领域对教育人更有关联。这就使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提高排名位次过程中,出现了系统性的偏差。

3 对新时期大学使命与人才培养目标的思考

哈佛大学校长福斯特(Drew Faust)在演讲中曾说过:“大学与所有这些组织(企业、政府等其他组织)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主要不是关注现在,而是关注过去和未来。”一所大学的精神所在,是她特别要对历史和未来负责,而不仅仅是对现在负责。邓小平提出“中国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大学办学必须要有三

种眼光——长远眼光、世界眼光、现代眼光,大学的使命要引领着大学自身创造未来的学问,思考人类的前途和命运,对永恒做出承诺。

首先,增强办学使命的“独特性”。每所大学要在国家提出的大学使命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特色准确定位办学使命。国外著名大学基本上都有自己的使命宣言,而且大学的使命具有鲜明的特色、有自己独特的定位,而不是整齐划一。梳理中国大学使命的表述,可以发现,很多高校并没有明确自己的大学使命,而是直接将国家对现代大学使命的表述作为自己办学使命。大部分学校以宗旨、校歌、校训等来陈述自己的办学理念,只能从这些表述中寻找他们办学使命的踪影。国务院颁布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鼓励高校在“双一流”建设中找准定位、特色发展。每所大学的办学历史、办学特色均有所不同,对大学的使命进行具有“独特性”的准确定位,有助于突出高校的办学特色,集中资源发展优势,形成自己的品牌。办学使命不清晰,过于聚焦于国家对大学使命的整体定位,无法引领“双一流”建设,形成办学特色。正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前校长伍德罗·威尔逊所说的那样,“普林斯顿不像哈佛,也不希望变成哈佛那样;反之,也不希望哈佛变成普林斯顿。”^[5]

其次,增强人才培养的“内生性”。人才培养是大学的根本任务、首要任务,已无须质疑,问题的关键是,人才培养的目标、内容和方法,如何适应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世界情势?如何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从历史上看,现代大学的实践与人才培养的目标是有差距的。中国大

学人才的培养要走“本土化路线”或“中国化路线”,通过建构起本土化的人才培养模式,激活大学发展的内生力。其核心在于以我为主,立足于中国本土高等教育发展的实际需要,学习借鉴西方大学办学经验,更尊重教育客观规律。大学的根本任务是人才培养,教什么样的书取决于我们思想认识中对“要培育什么样的人”的定位。因此,大学教育首先要解决一个哲学认识问题,要追问什么样的人才是社会现在与未来发展需要的卓越人才。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必然扎根于自己的文明传统之中,在知识产生、服务社会以及文明传承方面做出杰出贡献。梅贻琦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的“大学之道”表达了现代大学之道,明明德中的修己功夫中所谓“己”,是一个整全的人格,至少包括“知、情、志”三个方面,大学不仅要重知识和技术传授,也要对学生的人格培养尽力。“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本土化路线,就是希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扎根于中华文明传统,也就是习近平所说的“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

参考文献:

- [1] 李强. 大学理念再思考[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05(2):37-45.
- [2] 周廷勇, 熊礼波. 西方大学使命的变迁及其历史效果[J]. 现代大学教育, 2009(2):48-55.
- [3] 李博昊. 从古代走向现代:我国大学学术管理制度取向研究[D]. 沈阳:沈阳师范大学, 2014.
- [4] 钱颖一. 大学的使命(第一卷)[M]. 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6.
- [5] 肖木, 丽日. 普林斯顿大学[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2.

An Analysis on Evolution of University Mission and on the Goal of Professionals' Cultivation

YU Yan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fice, Beijing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2, China)

Abstract: The missions of universities at home and abroad show creative inheritance and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times in the process of evolution. In ancient China, there are doctrines of “Great Learning” that emphasise study on humanities and cultivation of personality. The goal of contemporary university is embodied as a utility tool, which incurred certain systematic bias to “Double First-Class” university construction and professionals cultivation. In the new era,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needs to enhance “uniqueness” in missions and goals, to enhance “endogeneity” in cultivation of professionals, to stimulate endogenous force of university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ndigenized modes of professionals’ cultivation.

Key words: university mission; cultivation of professionals; higher education reform of China

(责任校对 蒋云霞)